

DOI: 10.12361/2705-0866-05-

由斯坦贝克的华裔书写看其与中国之渊源

孟伟仙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斯坦贝克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华裔形象, 深入把握这些作品中华裔书写的总基调并深究其因可以发现, 中国元素曾与斯坦贝克有过短暂的相交, 他也由此对业已盛行的华裔套话做了相应改变。但是, 因一些不可抗因素的存在, 中国元素对他的影响并不持久。他的重塑之路更集中地体现在四十年代的作品中, 五十年代后华裔在其作品中渐渐退场。斯坦贝克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中国后, 也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 斯坦贝克; 华裔; 重塑; 影响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teinbeck Shown in Steinbeck's Chinese Characters

Weixian Meng

College of Foreign Chines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Steinbeck has created a varie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his works. With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se images, it can be seen that Steinbeck is influenced by Chinese workers and Taoist ideas which advocate him to reflect on the stereotype images of Chinese. However, such an influence did not last too long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some inevitable factors. He actually developed Chinese characters during the 1940s, but they gradually disappeared a decade later. Steinbeck has also influenced China in different stages to various extents since his wor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a in the 1940s.

[Keywords] Steinbeck; Chinese characters; reinvent; influence

引言

约翰·斯坦贝克之华裔书写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三十年代, 华裔仅作为其家乡加州多民族聚居中的一员出现, 对华裔的书写在沿袭套话的同时有所突破; 四五十年代, 他将重心转向二战与加州, 《罐头厂街》和《伊甸之东》等小说中的华裔立体而正面; 五十年代后, 他对华裔的关注度逐渐减弱, 《甜蜜的星期四》后华裔形象再也没有出现过。斯坦贝克华裔书写的主基调反映了中国元素对他产生的影响, 这也是他为美国社会寻找良方的力证。

1 套话与重塑

同欧洲国家相比, 美国与中国的接触较晚。18世纪西欧各国大多通过耶稣会士的报道了解中国, 美国仅仅从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大概了解到中国的身影。但自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起, 情形有了明显改变。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使得大量移民涌入美国, 华工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姜智芹,

2008: 150)。华工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 初到加州就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好感。然而, 文化冲突和种族偏见打破了这一平衡, 个中缘由不一而足,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白人认为华人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金矿采尽、横贯美国东西的铁路竣工后, 工作机会大大减少。华人愿意以极低的工资去干白人不愿意干的脏活苦活, 美国民众由此认为华工抢了他们的饭碗、降低了他们的工资标准, 遂掀起反华浪潮, 呼吁美国政府制定法规限制华人入境, 并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 在各方面歧视、侮辱华人。

受此社会浪潮的影响, 斯坦贝克笔下的华裔不可避免地带有些套话痕迹, 如黄祸、异教徒中国佬、华裔赌徒等, 但他并未将自己限定在这一框架中, 而是进行积极重塑, 以期其能真正融入美国社会。鲜有美国作家正视在美华工的艰苦生活, 遑论他们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但斯坦贝克在《伊甸之东》和《罐头厂街》中为读者真切再现了第一代劳

工的悲惨境遇。通过详细描写华裔的心理活动以及与其他族裔相比更显惨淡的生活，斯坦贝克进一步凸显了他们游离在主流人群之外的悲惨处境。他尽力打破华裔群体难以同化、素质低下的刻板印象，将其塑造为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中个性鲜明的少数族裔。他将《罐头厂街》中的商人李忠比作一颗亚细亚式行星，老子思想让他绕轨而行，但利益所带来的离心力又使其偏离了老子，这一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李忠在贪婪人性与高尚哲性之间的摇摆。道家思想中对物质欲望的淡泊是斯坦贝克颠覆常用套话的有力武器，他坚信这种淡泊钱财、守望相助的品质于当时快速现代化的美国而言是一剂良药。

2 相交之引力

斯坦贝克虽然从未来过中国，但西部的多族裔聚居生活让他从小便能与不同族别的人相处，其对中国的了解便得益于在美华裔。除为圆作家梦而去纽约闯荡一段时间外，斯坦贝克基本上一直生活在旧金山附近。这一地区各族裔交杂混融，不论是东部移民还是他国移民，都是这块土地上的陌生人，一起在这片新土地上构建自己的身份。作为第三代移民的斯坦贝克对这一情况深有体会，他极力肯定不同族裔人民与亚美利加相辅相成的关系：“根植于所有人种，点缀着各种肤色，他们似乎处于一种混杂的无政府状态。然后很快很快，我们变得彼此相似胜于差异——一个新的社会出现了；虽然谈不上伟大，但是我们所有看似缺点的地方恰恰孕育出真正的善和美——合众”（斯坦贝克，1989：2）。在那里，种族、肤色、社会地位不再是不可攀越的藩篱，人们保持着友好深入的交流，追求和而不同的差异性存在。受此影响，斯坦贝克能以极具包容性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因而他塑造华人形象时能够不为套话所囿。

四十年代，斯坦贝克将重心转向日益吃紧的战事，还作为官方记者去往欧洲和北非。一战时期斯坦贝克尚且年幼，对战事关注度不高。二战爆发后，他积极为国建言献策，曾致函时任总统罗斯福，希望组建一个宣传机构来联合全世界力量反对法西斯国家，后来他还提出用一种心理武器打败纳粹德国。虽然他的提议未被采纳，但他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切之心显而易见。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中国在抗战中遭受的灾难和做出的贡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再加上与美国日益密切的盟友关系，中国在美国的国家形象日趋正面化。这一时期针对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从盟友的角度出发的，出于团结华裔共克时艰的需要，斯坦贝克华裔书写的正面化乃是大势所趋。此外，在其早年作品中，作者对华人着墨不多，对他们的悲

惨境遇一带而过。但是，在《罐头厂街》中，华人是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出现的，斯坦贝克竭力呈现一个当地居民友好相处的场景。二战期间，中美国际关系的变化对这一时期的在美华裔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自身团结华裔的殷切期望使得他小说中的华人形象存在感更强、角色更加正面。

此外，斯坦贝克也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挚友爱德华·里基茨。阿斯特罗在研究他俩的友谊时直言：“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里基茨是斯坦贝克最亲密的朋友。如果要分析斯坦贝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那么就必须要仔细研究里基茨的生平、作品和思想（帕里尼，2019：80）”。虽然他们三十年代就已成为挚友，但道家思想对斯坦贝克的影响直到四十年代才在《罐头厂街》、《伊甸之东》等作品中有所显现，这与斯坦贝克因成名而引发的一系列困扰密切相关。《煎饼坪》出版前，他籍籍无名、入不敷出，甚至还要靠父亲的接济赖以为生。后来，《煎饼坪》的大获成功让他名声大噪、收入颇丰，但焦虑感随之而来，时刻担心富有会让他脱离实际，更会让作品失去生命力。《愤怒的葡萄》再次将他置于名利中心，他愈加惶惶不安。四十年代起，他开始有意避免各种社交，腾出更多时间与里基茨朝夕相处。刚刚经历过名利欲望扰乱的斯坦贝克在道家哲学中找到了栖身之地。他在《罐头厂街》中塑造的主人公不慕名利、信奉的老庄哲学，这再次证实了里基茨对斯坦贝克的影响之深。狄莫特曾检索过斯坦贝克的阅读书目，发现他曾读过不少中国典籍的英译本，仅《道德经》就有戈达德翻译的Tao The Ching和收入《中国印度之智慧》的林语堂译本。这些影响并没有立即反映在其作之中，而是在与他的创作意图相洽时才得以显露。斯坦贝克对道家思想的喜爱伴随着对西方现代文明弊病的批判，走进老庄哲学不单单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热爱，更是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

3 相交之余波

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和冷战使得中美关系僵化，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变得极为敏感，斯坦贝克开始减少谈及此类问题。在他先前的构想中，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所以他笔下的华人基本都是圆融求和的形象。但五十年代的插曲让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认知，本是美国盟友的中国竟突然与西方对立起来。他推崇中国智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观照美国当下的社会问题，但当两者成为对立关系时他开始变得无所适从。麦卡锡主义的泛滥更让他在有关中国的题材上有所顾忌。他极为痛恨麦卡锡等人的迫害行径，曾在《美国与美国人》中对其进行声讨，直言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

以阴谋手段来制造恐慌,但因早年作品对工人罢工现象的过多关注而招致的一系列调查让他心有余悸。更为重要的是,排华措施使得华人入境量锐减,也有许多移民返乡,在美劳工基本上均为男性,白人优越论极大限制了异族通婚数,所以在美华人数量保持着极低的增长率。人数减少的同时,他们在就业与住房层面也竭力避免与其他族裔的竞争。与此相反,墨西哥裔移民的大量涌入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斯坦贝克便将关注点转到了更弱势、矛盾更为突出的墨西哥裔移民身上,华裔形象渐渐淡出他的作品。在《甜蜜的星期四》中,李忠离开了美国,他小说中的华裔也自此全部退场。此外,李忠在该作中又恢复了三十年代作品中的华裔形象,成为主人公眼中的边缘人物,而且与之前塑造的人物形象有所割裂。这一转变既与社会环境有关,又与挚友里基茨的辞世紧密相关,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随着中美关系的转变与好友的离世而逐渐消退。斯坦贝克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美国走出现代化困境,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抵抗美国社会转型期唯利是图、道德堕落等风气对美国民众的侵蚀。但是,冷战日益紧张的局势、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回温使得道家思想的精髓没有为大众所体悟,他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热情在四十年代达到峰值后便迅速消散。

斯坦贝克于四十年代初被译介进中国,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80多年中,对他的译介在数量上与评价上各有不同,其中折射出中国社会变迁及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早在1940年9月,上海西风出版社就在其主办的刊物《西书精华》第3期上刊载了乔志高编译的《愤怒的葡萄》的第一章,题名《怒之果》。紧接着在1941年6月,《文学月报》在其第三卷第1期上刊载了由知名作家秋蝉译介的《愤怒的葡萄》片段,题名《苍茫》。同年5月和10月,《愤怒的葡萄》的两个中译本分别在上海和重庆出版。五十年代对欧美国家文学的翻译局限于符合进步标准的作家作品,斯坦贝克也位于其列。但五十年代末开始,左倾意识愈演愈烈,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控制极为严重,符合翻译选择标准的作品也越来越少。六十年代初,欧美文学的译介受到了最高当局的批评。文革开始后,文学翻译完全停止,到了文革后期的1972年,才开始有限度地恢复(查明建,2004)。值得欣慰的是,即使在政治主导着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的几十年中,仍然有一些译者与作家能够抛开政治的藩篱而去关注作家作品的自身意义。胡仲持1959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四十年代译的《愤怒的葡萄》的旧译修订本,白桦也表达了对斯坦贝克的肯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国政治发生重大转折,文学翻译得到了国家的政策性支持和改善,政治文化语境弱化了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作品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得到了肯定和关注,斯坦贝克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除了再次译介已有作品,他的其他作品,如《烦恼的冬天》、《伊甸之东》、《珍珠》、《战地随笔》等也得到了相应译介。斯坦贝克的作品为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民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处于新时代的我们也要从其作中汲取养分,更好地做到反思过去、观照当下及放眼未来。

4 结语

排华的社会大环境与前人作家的套话书写对斯坦贝克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他无意识中沿用那些话语。但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与四十年代的二战给斯坦贝克提供了沉淀下来思考的契机,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高度责任感让他走进并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他由此重塑了华裔移民形象。然而,这一转变并不持久。五十年代,冷战的爆发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斯坦贝克再次减少了对华裔问题的关注,作品中的华裔形象逐渐消失。斯坦贝克译介进中国后对国内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不同时期意识形态的变更。

参考文献:

- [1]董霄阳. 斯坦贝克小说中的华裔形象书写[M]. 山东大学, 2022.
- [2]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 《美国的中国形象》[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 [3]姜智芹. 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杰伊·帕里尼著,马静静,陈玉洪译. 《约翰·斯坦贝克传》[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 [5]田俊武,张和龙. 中国斯坦贝克研究70年历程概观[J]. 《外国语文》, 2014, 第30卷第6期, 46-51.
- [6]约翰·斯坦贝克著,黄湘中译. 《美国与美国人》[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9.
- [7]查明建. 文化操纵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第2期, 86-102.
- [8]查明建,谢天振. 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卷)[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 [9]赵毅衡. 诗神远游: 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